主编/郭晓蓉 责编/张宸 校对/卢阳 美编/马佳雯
电话：(010)84078838—8080 本版邮箱：wwbkaogu@163.com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取得重要收获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明代制瓷窑场全景（D7地块，东向西拍摄）

山西蕴藏丰富的制瓷原料和优质燃料，水系发达，制瓷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的重要区域。山西自古有“表里山河”之称，地形地貌虽相对独立，但各区域间交通孔道发达。因处于河北、河南、陕西等重要传统制瓷区域的环绕之中，发展陶瓷生产具有极为优越的条件。每个历史阶段，山西陶瓷手工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就和价值，其中不乏开创性贡献。

宋元时期是陶瓷手工业大发展时期，山西地区窑业也步入发展高峰期，并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从晋南至雁北，窑场遍布全省各地，制瓷工艺多样，瓷器品类丰富，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明显。山西自古是文化交流、交融的大通道、大舞台，考古学文化呈现强烈的多样性和可追溯性，聚焦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政权下创造出的陶瓷物质文化，来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形成的恢宏进程是山西考古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近年来，山西陶瓷考古工作主要着力于区域视野下窑址系统调查、复查和对重点窑址开展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考古工作理念及方式从之前的野外调查、小规模了解性质的发掘向以流域、区域为单位、开展一定区域内系统综合调查和重点窑址深入系统发掘转变。山西古陶瓷从明珠蒙尘到崭露峥嵘，其历史概貌与非凡成就也正得以徐徐展现。

“山西古代瓷窑址区域考古调查与重点窑址发掘研究”是对山西古代制瓷手工业遗产资源、窑址保存现状、研究现状及学术贡献等多方面进行理性分析和科学研判之后，制定的陶瓷考古整体学术规划构想。旨在分区域厘清全省古代瓷窑遗址保存现状，了解各窑址、各区域的产品面貌、工艺技术传统，建立基于考古学基础之上的年代发展序列。在点上深入、在面上覆盖，逐步搭建起山西地区古代制瓷业体系框架，系统书写山西古代陶瓷史。从北方地区整体陶瓷发展演变过程中，填补有关山西部分的缺环，还原山西在古代陶瓷发展史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2016至201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河津市昌梁山南麓遮马峪、瓜峪沿线进行区域性系统调查，并对固镇瓷窑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9年，对昌梁地区古窑址开展系统调查和复查，同年抢救性发掘了兴县西磁窑沟窑址，揭示出以“柿色彩”瓷饰为代表的独具地方特色的瓷业面貌和昌梁山区季节性生产的小型区域性窑业经济形态。

2022至2023年霍州窑的考古工作是践行该学术规划的第三个窑址。

工作缘起

霍州窑，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地处汾河西岸台地边缘，窑址基本叠压在村庄之下，1986年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村窑址自20世纪70年代发现之后，故宫博物院、临汾地区和霍县等文物部门曾对窑址做过几次野外调查工作，并有简单的调查报告公布；随后多是古陶瓷学者、瓷器收藏爱好者私人性质的踏查和瓷片采集。霍州窑因史料有载，颇为闻名，但相关研究始终停留在调查资料基础上，进展不大。

霍州窑址发现近50年以来，一直没有开展过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目前学界存在对霍州窑址分布范围不清，窑业生产始烧、终烧年代不明，瓷器产品内涵认识单一、片面以及霍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地位揭示和认识不足等诸多问题。

2021年，霍州市委、市政府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大力推进文物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霍州特色优势文物资源——霍州窑，决心对霍州窑址进行总体保护，将霍州窑的保护纳入霍州市“十四五”文物发展规划，对霍州窑址分阶段推进保护利用，并启动了《霍州窑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经山西省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霍州窑址开展了详细的调查和勘探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至202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联合对陈村瓷窑址开展了首次考古发掘工作。

调查勘探

陈村位于汾河西岸台地上，窑址的保存现状总体较差。窑址主体从陈村小学一直延伸至村南南沟一带，窑址大部分现被陈村旧村的房屋、院落、硬化路面等覆盖，少量地块为耕地。陈村基本位于汾河阶地边缘，汾河河道在西岸变宽，历史上河岸线摆动较为频繁，窑址就在汾河的冲刷洗礼中残存了下来。考古队依据陈村历史卫星影像、现状实测图和陈村地表现状，将所有调查区域分为地块、房屋、庙宇三类，分别编号建档，逐地块调查登记。野外调查面积40万平方米，基本上掌握了陈村房屋地块旧属信息和窑址分布状况。

勘探工作按照最小地块为单位开展，依据地块面积、地表附着物等选择可勘探区域，合理布孔，做到以最少探孔，了解地下堆积走向和性质。普探面积约26000平方米，重点勘探面积2000平方米，布设探孔3000余个。

通过半年的野外调查和勘探工作，基本确定了陈村窑址的分布范围，了解了窑业遗存分布规律。勘探过程中发现多处瓷片、炉渣等窑业堆积，确定不同时期窑炉12处。勘探工作对陈村瓷窑址的年代、堆积内涵及分布状况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为后续发掘工作的选址奠定了扎实基础。

陈村瓷土矿源专题调查面积约2平方公里。主要调查区域为霍州窑址西部偏北，山沟里发现1处瓷土埋藏区，从而确定了霍州窑瓷土原料来源。

窑业遗迹

在前期系统调查和勘探基础上，选择8个地点发掘，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揭露出金元明时期窑炉9座、作坊9座、灰坑40个、沟2条、井1个等多处窑业遗迹，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取得了重要的收获。现将各时期的窑业遗存举例说明。

金代遗迹以D25地块金代作坊（F1、F2）为例，两座作坊均位于地表以下5.9米，上部有厚达3米左右的二次堆积，表明这里早期窑业废弃后曾有过大规模的扰动行为，明清时期又在此处烧瓷。

F1位于发掘区的东南角，坐西朝东，只揭露出两道里砖墙，后墙南北向，墙长2.1~2.4米，高1.3~1.56米；北墙上半部分有倒塌，向东深入东隔梁，现存长2.5米，高0.45~1米。作坊的南墙应在探方南壁中，已揭露作坊内空间东西长3.06米，南北宽1.5~2.2米。

F2位于F1北部，坐西朝东，与F1有一定夹角。由东西向一道匣钵墙和一道砖墙组成。南匣钵墙为匣钵与砖石混筑，东西长4.7米，高1.2米，西半部分为直立，东半部分已倒塌；北墙为砖砌，砖呈现被火烧过的红色或黑色，应为窑内用砖的二次利用，现存3~8层砖，东西长3米，高0.3~0.6米。已揭露作坊内空间东西长5米，南北宽2.6~2.75米。F2前后均深入探方东西壁中。两座作坊的开口深度基本特平，为寻找金代窑业提供了标高参照。

元代遗迹以F20地块Y1为例。Y1在生土中掏挖火膛、过洞式通风道。窑床位生土而建，窑床以上全部不存。火膛呈月牙形，内径长2.25米，宽7.5米，壁厚17厘米左右，深1.05~1.25米，火膛上部一周由耐火材料残砖垒砌而成；通风道呈拱形，高0.95米，宽0.7米，进深1.3米。火膛及进风口内填土为煤灰渣，出土物以细白瓷为主，可辨器型有折沿盘、高足碗、敞口碗等。Y1通风道朝向东北，其打破的Y2形制与Y1相似，唯方向朝东南。由于发掘面积所限，推测这里应是依据生土原始地形而随地形掏挖的窑炉，并没有统一的朝向规划。

明代制瓷遗存以D7地块发掘区为代表。D7地块经过两年的发掘，揭露出一处由一座窑炉和三孔砖券窑洞构成的明代制瓷窑场。整个窑场位于坐西朝东的平台上，西部为高于窑场的阶地断崖，东部边界为断崖，北半部已坍塌。窑炉位于区域内东南角，其北部并列三孔窑洞，由南向北依次编号为F1、F2和F3。

F1只揭露东半部分，东西长12.8米，南北宽3.3米，窑洞以火坑所在墙为界，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部似是小院，内部是窑洞室内。火坑位于室内东南靠墙处，坑的西端中部为单眼火坑，坑内三条火道汇总至东南角烟囱中。火坑东西长2.38米，南北宽1.36米，残高约0.45米。火坑北、西侧以砖铺地，火坑西部有一澄泥池，澄泥池对面北部有粗料池和釉缸，再向西地面未铺砖。

F2进行了全面揭露。F2窑洞通长20米，宽3.45~3.85米，分为前后两室，西部末端掏挖有一个小窑洞。F2窑洞残存高度不等的砖砌两壁，西部可见明显的券顶残部。窑洞地面局部残存铺地砖。前后室的交接处有坍塌的匣钵堆积，应是空间间隔墙。窑洞入口部南侧有带灶的长方形火坑，西侧中部为灶，灶下通向坑内三条火道。火坑东西长2.2米，南北宽1.7米，残高0.2~0.35米。F2自上而下内几乎都为淤积土堆积。

F3东西长8.9米，宽3.25~3.4米，室内东半部分以方砖铺地，西半部分以条砖铺地。室内东南角有一个灶台和土炕。

依据现有材料推断，F1应当是直接与制瓷流程相关的作坊，F2为存放瓷坯的场所，F3为窑工的住房。

窑炉（Y1）为馒头窑，体量较大，整体保存较好。窑炉由进风道、窑门、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室及护墙等组成。东西长8.7、南北宽4.4、残高3.2米。

窑室近底部保存较完整。窑床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9、东西宽1.8米，后壁用残匣钵片砌成5个排烟孔。排烟孔后接2个烟室，平面均呈扇形，南侧烟室长1.4米，宽1.2米，残高45厘米。火膛平面呈半月形，南北长3.9、最宽处1.1、深达2.7米。火膛底部有厚约20厘米的灰渣层，其下为硬面。火膛西壁直立，用残匣钵片和耐火砖隔层砌成挡火墙。火膛入口处为窑门，宽约1、高约1.8米，整体呈长条形，顶部由长条状石块横搭，其下为条砖与石块砌筑。窑内多为淤积土和匣钵残片堆积。

进风道为长条形，自上而下设8层台阶延伸至火膛底部。呈东西走向，宽0.9~1.3米、现长3.6米，两壁由废弃匣钵和石块砌筑。进风道平面南北两翼设有护窑墙，由石块砌成，护墙宽约0.4米。

陈村窑址地貌（东北向西南）

F66、D20地块发掘区航拍（上为北）

F20地块发掘区航拍（上为北）

D25地块发掘区三维模型（西北向东南）

F4作坊航拍（右为北）

D15地块发掘区航拍（右为北）

霍州窑考古与规划专家座谈会纪要

金代细白瓷印花盘（婴戏莲纹）

金代细白瓷印花小碗（六栏 奔鹿纹）

金代细白瓷涩圈印花盘（莲花芦苇香蒲茨菇纹）

元代细白瓷鱼纹印花盘

金代细白瓷印花盏（八栏 兔子纹）

元代高质量素面细白瓷折腹盘

金代细白瓷碗（水波禽鸟纹）

金代细白釉枕

元代高质量素面细白瓷高足杯

明代细白瓷褐彩花卉纹碗

元代白地黑花涩圈盘

明代细白瓷矾红彩五爪云龙纹碗（藩王府用瓷）

明代白地褐花高足杯

明代剔划开光鸟纹黑釉杯

清代顺治十三年纪年粗白瓷器物残片

出土遗物

从土山庙地点的探沟发掘初步成果判断，霍州窑约在北宋后期或金代前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形成了以细白瓷产品为主流特色产品，“涩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和细凸线纹印花为装饰特征的产品面貌。细白瓷产品胎体洁白而坚致，器类小巧而多样，釉层稀薄而光亮，釉色洁净而明快。常见器形有浅盘、小碗、小盏、玉壶春瓶等。器物内壁中下部常有细凸线纹印花装饰，纹饰或疏或密，不用边饰。纹样题材富有生活情趣，艺术风格活泼而灵动，常见纹样有水波禽鸟、缠枝花卉、蝴蝶花卉、莲花童子及奔鹿、兔子等动物纹等。纹样布局或为二方连续，或以六、八、十等分分栏布置。印花纹饰中偶有“郭窑瓷器”“廉家”“李一造”“郭七”及“同大”等不同姓氏的标记，表现出以涩圈叠烧为主流支烧技术，胎体黄白，器物造型圆润、圈足较高。

霍州窑元代产品仍以细白瓷产品为大宗，常见器物有折沿小盘、高低不同的各类竹节状高足杯、带鬃沿小盏、龙柄小杯、折沿大盘等。器物常常有瓜棱腹作法。印花纹样多见于器物内底和下腹壁，纹样较金代简单，印花纹果由细凸线向浅浮雕转变，印花纹样立体而有层次感。常见鱼纹、并蒂牡丹、莲花等，也有少量划花装饰。质量最高的素面细白瓷产品造型极为规整、修坯精细、支烧痕极小，器物可见折腹盘、曲腹碗和高足杯等。元代霍州窑的产品在元大都、元中都、哈剌和林古城及集宁路等地均有出土，表明霍州窑产品曾销往高端市场，很可能已经进入了宫廷消费。“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为霍州窑独特支烧技术，也是霍州窑的核心尖端技术。极小的支烧钉痕使粘钉理化特性、器物胎体重量、保障产品产量和燃料经济节约四者之间达到了巧妙的平衡，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物内底接触式支烧方法中，所留支烧痕迹最小的支烧方法，是北方地区北宋故官式器物“芝麻钉支烧技术”传统的延续与革新。元代还生产涩圈简笔黑褐花装饰的粗白瓷产品。元代是霍州窑烧造历史中最为闪耀的时刻，在北方地区白瓷窑场生产普遍衰落的形势下，霍州窑以工艺精湛、造型薄俏的细白瓷产品而一骑绝尘，成为全国唯一生产精细白瓷的窑场，是继邢窑、定窑以后，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最后高峰，也成为元代手工业门类中陶瓷手工业的杰出代表。

霍州窑在明代生产规模扩大，除桑压在金元时期窑业之上以外，在空间分布上也有较大扩展。产品以化妆白瓷为主，常见碗、盘、高足杯、盖、罐、瓷塑等。主流装饰技法为白地褐花和黑花，纹样多样，有简笔花卉、开光鸟类、人物、松树等，绘画手法多为细线描绘，艺术风格兼具工笔与写意，写实与意趣共存。胎体较粗，但在画工、工艺上可看到宫工圈料细作的巧思。支烧技术上继承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传统，只是粘钉中配方有所变化，粘钉变大，后期粘钉中还掺入石英砂，呈现出稳定的支烧技术传统和清晰的演变轨律。

明代霍州窑产品除大量供应百姓日常生活需要之外，还发现了写有“文庙祭盘”的白釉盘、粗白瓷盖豆等性质明确的礼制祭祀用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明代霍州窑还因其持久的细白瓷生产技术积累，一度为山西地区明代藩王府烧制细白瓷矾红彩五爪龙纹碗、盘、杯等高档用瓷。明代霍州窑多种面相的生产面貌深刻影响了明代社会生活的不同阶层。清代地层中出土了“堂内供缺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内做造”的纪年残器，表明霍州窑一直延续至清代。

意义与价值

霍州窑明代窑业遗存的发掘在北方地区明代陶瓷考古中也具有开创性意义，这是第一次对北方地区明代陶瓷社开展的一定规模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工作，对于北方地区明代陶瓷生产编年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可深入推动南北方明代制瓷业生产对比研究等课题。值得指出的是，在建筑考古的理念下，大规模揭露出一处由1座窑炉和3组砖券窑洞式作坊构成的相对完整的明代窑业建筑遗存，这是明代北方地区一种全新的窑业生产布局形态，是系统、完整展示明代窑业生产格局的重要实物资料，也为研究陶瓷手工业遗产景观的演变规律和陶瓷手工业专门生产地的人地互动关系等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可能。

霍州陈村瓷窑址系统的考古工作，明确了窑址的保存状况、分布范围和窑业遗存分布规律。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霍州窑金、元、明和清时期的产品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霍州窑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北方地区白瓷业发展，特别是精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是北方地区陶瓷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作为元代精细白瓷唯一的生产地，其产品形制和审美引领了元代的社会风尚。明代霍洞式窑业生产格局更是丰富了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生产经济形态。

霍州窑是在充分分析自身资源、技术优势，在保持区域瓷业传统基础上，找准产品市场定位，突出于自身特色，精于生产经营策略的窑场，其产品面向官方高端市场和民间日用市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霍州窑各时期多面向的产品面貌和产品流向，必将推进陶瓷手工业参与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塑造、人地关系等方面的广泛研究。

霍州窑阶段性的演变轨迹是山西汾河流域宋元时期窑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霍州窑的考古新发现充分说明，处于北方陶瓷手工业主要生产区域——冀、豫、陕等之间的山西地区，凭借其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彰显出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更多的缺环将在山西地区得到填补，更多的贡献将在山西地区得到揭示。山西陶瓷考古值得期待！

（撰文：刘岩 穆文军 李彦昕 摄影：郭东芳）

金代细白瓷玉壶春瓶

金代细白瓷涩圈印花盘（水波人物纹）

元代细白瓷龙柄小杯

元代细白瓷高足杯

2023年12月3日，由山西省文物局指导，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共霍州市委、霍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霍州窑址考古与规划专家座谈会在霍州市召开。

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古陶瓷学会、故宫博物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圳市文物鉴定所、深圳博物馆、深圳望野博物馆、山西博物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西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研究院等机构的十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上午，与会领导、陶瓷及规划专家学者赴霍州陈村窑址考察考古发掘现场，观摩出土瓷片及标本。下午召开专家座谈会，山西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雪冰到会指导。霍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相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霍州陈村瓷窑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汇报了2022-2023年霍州窑的考古工作，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王璐副教授汇报了霍州窑保护规划编制阶段性工作成果。随后与会专家学者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交流讨论，对霍州陈村瓷窑址两年考古工作的思路规划、实施步骤、发掘成果及初步研究给予了肯定，并就霍州窑窑业生产时空布局、产品特色、装饰装烧技术、产品流布、瓷业生产所反映的人地关系的转变、文化交流融合以及霍州窑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等进行了深入阐释，为下一步的考古工作、研究阐释、规划编制、展示利用等提供了有益的学术指导。

专家考察窑址发掘现场

李青雁
中共霍州市委书记

2021年霍州市委市政府启动了霍州特色优势文物资源霍州窑的总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并把霍州窑的保护纳入到全市十四五文物发展规划。2022年，在省文物局的指导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霍州窑址开展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2022-2023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连续两年对霍州窑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为霍州窑址总体保护规划的编制和霍州窑文化内涵的揭示和研究，展示和利用，提供了阶段性的成果和科学依据。霍州窑址考古与规划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践行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是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的生动实践，也是霍州市深挖霍窑时代价值、走产业转型、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切实举措。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为做好霍州窑址考古、规划编制、陈村村舍基础设施改造及霍州地方文化基地建设等顶层设计建言献策，霍窑一定能够像我们的威风锣鼓一样，声震华夏，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黄信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以岩副院长为项目负责人的霍州窑考古项目团队田野考古工作做得很规范、很漂亮，体现了山西陶瓷考古的高水平。霍州窑代表了元代中国北方白瓷的最高水平，是北方地区细白瓷最后的辉煌、最后的绝唱，在陶瓷发展史中应该有非常高的地位。产品有自身特色，器形上的定窑，但装饰方法上自成体系。考古发掘中霍州窑最兴盛、水平最高的元时期的遗迹揭露相对较少，希望下一步地方政府加大相关支持力度，从考古遗迹方面上更多展现出霍州窑的高光时刻。

孟耀良
山西博物院研究馆员

两年的考古发掘确认目前霍州窑最早的年代是金代，但从多年的调查材料来看，陈村当在北宋时已经烧造了，只是限于考古发现的局限性还未发现相关遗物。整个北方地区关于蒙元时期的窑业面貌还分要引起重视，山西约有50年时间实际上已经处于蒙元控制之下，希望霍州窑在下一步发掘整理工作中予以甄别。发现的明代砖红彩五爪龙纹细白瓷残片非常重要，时代当是明代中期以前，系明代藩王用瓷无疑。

任志录
深圳市文物鉴定所研究馆员

霍州的考古工作很受地方政府重视，今天霍州方面的主要领导悉数到场，充分体现了这点。考古发掘作了充分的准备和规划，考古清理手段上，保留了作坊内完整的遗迹现象，考古理念上注重细节，这点特别有亮点。对窑址的认识与判断很好，霍窑产品流布从山西到全国，视野比较开阔。

霍州窑的地位黄信院长讲的定位非常好。此次发掘对霍洲时代金、元、明、分得清清楚楚。霍州窑产品的几个特点如精细白瓷、涩圈、印花、素面细腻小支钉等，在陶瓷考古界乃至国外已经达成统一的认识，霍州窑瓷器是具有世界文化意义的一个瓷器品种。

元代素面精细白瓷产品满釉、圈足内外均施釉、不施化妆土，很自信、率性，质量极高。由此也引起我们对于元代瓷业普遍衰落的认识的一个反思，好多被定为金代的产品可能是元代生产的，如钧窑的某些产品、北方的黑釉油滴产品等。

王光尧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霍州窑考古工作总体上是一个有规划、有思考、有明确目标的科学考古工作，工作细致，成果特别突出。目前项目负责人对考古遗址的分析，对主要产品的认知也是非常到位，且在田野考古阶段就能注意到文物保护和未来的展示。

霍州窑五支钉的技术传统体现了对北宋汝窑先进技术的互鉴和传承。霍州窑产品北向流布且在都城等高等级遗址中出土，体现了在元代蒙古上层社会的重要地位；鉴于明代政府对瓷器业税收的关注，霍州明代窑业的生产一定在官府管理制度之下；明代五爪龙纹残片是王府用瓷无疑，还要注意文庙祭器、祭礼器与朝鲜粉青砂器中礼器的关系；霍州高质量的白瓷出现要从陶瓷发展史中制瓷中心移动的角度来考量，很可能是金、元社会民间瓷器呈现出来的考古学现象，是多元一体物质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州窑延续时间长，本身又是古村落，下一步要坚持整体保护的思路。

柴晓明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

霍州窑两年的发掘，是一个计划周密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做得很细，现场干净整洁规范。开展调查工作之前注重了早期卫星影像图的比对，发掘后通过地形高程对窑业分布规律做了推断。陈村现存80余座百年以上的老房子，这些房子是否与窑业延续有关值得日后做民族学调查。霍州发达的窑业要和周边甚至山西地区宋元时期发达的物质遗存综合统筹来认识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和价值。

孙新民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

山西从河津窑被评为十大考古新发现开始，这几年取得了重要成果，山西陶瓷考古大有可为，应该坚持做下去。霍州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对古代陶瓷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令人钦佩。

霍州窑基本被村庄所覆盖，虽然保存情况一般，发掘区域也很有限，但霍州窑的考古工作非常细致规范，并做了初步的研究。从考古成果上来说比较全面揭示了霍州窑的制瓷历史、工艺特点、发展演变过程；揭露了一处规模较大的明代完整的窑业遗存；呈现出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名窑，是继定窑之后的白瓷生产高峰，这是其在陶瓷史中的定位。下一步窑址要做各时段窑业遗存包括古村落在内的整体保护。

郭学雷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霍州地方政府重视霍州窑的考古与保护工作，令人印象深刻。霍州窑的考古队伍强，省考古院之外还有北大和复旦团队的加盟，相关工作开展得很有章法。考古成果很丰硕，呈现出霍州窑金元明时期全新的面貌和认识。元代制品的发现可以纠正《格古要论》记载中关于霍窑记载的偏差，霍州支烧工艺从根本上是解决窑场间经济竞争的问题，元代是霍州窑业的最大亮点。明代产品可圈可点，藩府用瓷非常值得关注。关于霍窑创烧年代当是北宋，要在田野考古上争取得实证和突破。

王小蒙
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霍州窑址的考古工作意义在于将聚落考古的理念和陶瓷考古的方法结合了起来。从工艺体系上揭示了霍州窑的发展历史，从考古学上对各期产品的年代进行了认定，对元代最高工艺成就进行了认定，对霍州窑支钉装烧技术演变规律做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下一步工作建议在不同时期生产区域的规律性和同时期产品生产分工上找到考古学上的证据和突破。

阎焰
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

从霍州窑的考古成果来看，其精细白瓷印花解决了大批量生产问题，霍州能有高质量图案性的印花白瓷，暗示元代窑业生产水平可想象的潜力和空间很大。霍州窑的支钉的“尖端技术”是跨越了宋窑，直接获得了或者说是在获取支钉技术后提出了自己的改良和技术革新。明代矾红彩龙纹系藩王用瓷没有疑问，其技术来源还是山西本土金元时期的红绿彩技法，从这个层面讲山西窑业应该会有非常大的可期待空间。如今霍州窑考古发掘工作可以说是“刀尖上跳舞”，如此小的面积做出如此成绩太不容易，希望可以扩大发掘范围，以揭示明代以前的窑业遗存为主，更好串联起山西陶瓷史的年代史，这个意义更大。

刘朝晖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复旦很有幸作为合作方参加霍州窑址的考古发掘。大家对于霍州窑认知的突破无疑得益于此次发掘工作。当今陶瓷史研究非常关注的区域之一就是山西地区。元代是霍州窑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其精细白瓷放到全国范围来看也毫无疑问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从白瓷发展的系统来看，要跟整个北方地区以及山西的窑业系统结合在一起。明代整个中国的窑业被景德镇所笼罩，事实上之地窑场有它自身的特色。明代矾红彩类瓷片的时代个人认为在明代早中期，且这个时候纹饰来源是有“样”的。关于祭器问题可能要从地方性角度去考量。霍州窑的多面相的生产面貌值得关注，与景德镇明代窑业的对比研究以及北方明代窑业标尺的建立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丁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

霍州窑的考古发掘的工作，主要有4方面的成果。一是填补空白；考古工作建立起了分期标尺；霍州窑填补了北方地区白瓷窑业，特别是精细白瓷发展的缺环，是北方地区陶瓷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二是层次丰富；产品进入了高端市场和地方市场，是研究霍州窑与统治上层和传统地方社会互动的重要线索。三是瓷业交流；霍州窑产品展现出北方地区各窑场间的互动交流，引领了元代陶瓷的文化风尚；明清时期的遗存也呈现出与南方地区窑场的互动交流，表明了其生产的开放性。四是人地关系；霍州窑的考古工作，体现了聚落考古与建筑考古的理念，体现了当前研究的前沿理念。考古工作注重窑场建筑的空间布局情况，相对完整地揭示出了全新的窑业生产布局形态，对于理解中国陶瓷生产形态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

王晓毅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

感谢专家对我们考古院霍州窑址考古工作的高度认可。规模庞大的霍州窑址上若干个点状区域的抽样式发掘，只是揭示了霍州窑冰山一角，下一步还需继续开展工作，尽可能完整揭示霍州窑整个瓷业生产历史和面貌，不断推进霍州窑的研究走向深入。关于霍州窑址的规划思路很开阔，细节也考虑地很细致。霍州窑址同时还是一个传统村落，是一个综合体，下一步得规划先行，保护利用按照规划来做。做好文物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可考虑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或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公园的建设规划与考古工作计划要有效衔接。地方政府可去已经挂牌的窑址类国家遗址公园调研取经。霍州的文化资源总体上要统筹考虑，打造成山西中部的知名文化旅游城市。

赵琛
中国长城研究院院长、教授

我是做地上建筑研究的，今天终于看到了地下发掘出来的窑业遗迹和遗物，惊诧于霍州窑细白瓷的精细和胎体的轻薄，这类产品当是高档产品。霍州窑无论金、还是元代的产品，都是中华民族物质文化的生动体现。霍州陈村之所以产生一步发掘整理工作中予以甄别。发现的明代砖红彩五爪龙纹细白瓷残片非常重要，时代当是明代中期以前，系明代藩王用瓷无疑。

闫向东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各位专家对省考古院的霍州窑考古团队给予了高度评价。考古队不仅挖掘了地方陶瓷文化遗产，同时也将他们的学术精神和敬业精神也带到了霍州。霍州市委市政府对于地方文化高度重视，提一点简单建议：今后应继续加强霍州窑的考古工作，这两年的考古成果尽快整理成报告；可以考虑在霍州建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霍州窑址工作站或山西陶瓷考古研究中心，地方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做好硬件设施的保障。同时也要加强同中国古陶瓷学会的合作，适时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深入研究霍州窑的陶瓷文化，擦亮霍州窑的文化名片。

吕国俊
山西晚报副总编辑

我是做媒体传播的，从霍州的文化价值传播方面谈几点。金代和元代创造陶瓷文化应该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物质文化角度来阐释。元代霍州窑代表中国北方地区白瓷最高水平，是白瓷最后的辉煌和绝唱，这个地位要抓住。霍州窑的印花装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独特的五支钉实端技术，都是传播宣传上应该抓住的亮点。

白雪冰
山西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各位专家对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霍州窑两年的主动发掘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特别欣慰。下一步的工作首先应该做好陶瓷生产链的研究，再对一些重点区域做深度持续的发掘；第二要关注霍州市的区位优势，开展宋元时期霍州陶瓷、古建、霍山中镇等多种文化遗产形态的综合研究；第三地方政府要从高标准保护、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展示方面提前谋化，今后的活化利用、产业业态方面如何与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融合，以及省级文物保护旅游示范区的创建等统筹考虑。

（整理：刘岩 李彦昕 段双龙）